

等以实力相抗，演成国内党派军队各有各的山头，各有各的利益，相互防范、磨擦，保存实力，乃至公开冲突，一边打日本，一边想着如何保存自己那一党一派的看家本钱，这难道不是中国抗战最大的一种遗憾与悲哀？但是，坏事未必不可以变成好事。

我们中国人一向讲求实事求是。所谓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；所谓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大都是前人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经验之谈。回避我们抗战史上的所存在的遗憾与悲哀，把我们的力量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，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让人尊敬的荣耀。恰恰相反，“知耻近乎勇”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种遗憾与悲哀，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，我们恐怕更能够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后人奋发图强，更容易从中找到后事成功之“师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

国外和港台对抗日战争 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

张注洪

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抗战期间就已有诸多中外人士进行战地考察并写成著述；及至胜利之后，更有许多学者从事有关研究，形成大量著作和论述。在国外和港台，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已成为不少学者和人们研究关注的热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半世纪发表的抗战史著作中，美国 109 种，俄国和前苏联 73 种，日本 307 种，港台著述 403 种，重要论文 5000 篇以上。

美国对抗战史的研究开始较早。当年美国记者来华考察访问

已奠定了初步基础,后因“冷战”使研究濒临中止,六七十年代始渐复苏。八十年代《剑桥中华民国史》(内有抗战部分)以及较广泛的抗战史研究专著的出版,多能据史籍力求反映抗战的基本进程。唯少数作者或掌握史料不够或缺乏科学分析,以致对待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问题,论及国共短长和中共政策时,某些结论失之偏颇。

作为当年反法西斯国家主要成员之一的前苏联,对于抗战史的研究依然显得滞后。五十年代前后苏联出版过论述抗战进程和统一战线的书。六七十年代中苏论争期间出版有《延安日记》(后由俄国学者指出系膺品)以及战时苏联军事顾问使华回忆录,内容未尽准确。即就同时问世的论著亦带有严重意识形态的痕迹。八十年代后俄国抗战史研究续有进展,以中共的统一战线、土改和知识分子政策、苏联对华援助内容为主。

日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。《太平洋战争史》以及几本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命名的著述,颇具学术价值和一定的社会影响。但有的作者或政客不顾历史事实,篡改历史教科书,称南京大屠杀为“虚构”,替日本军国主义开脱战争罪责,受到日本进步学者的谴责。

此外,英、法、德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对抗战期间的中国历史、日本侵华罪行以及中外关系都有论著发表。澳大利亚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尤颇具创见。

至于港台研究抗战史的著述数量可观,诸如蒋纬国主编的《抗日御侮》,台湾史政编译局主编的《抗日战史》,吴相湘的《第二次中日战争史》等,均着重反映和研究正面战场,忽视或片面反映敌后战场,这种倾向多年如此,迄未完全改观。

国外和港台有关抗战史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:无论史料的提供(如正面战场、中外关系史料),某些理论的借鉴(如对战时毛泽东思想的评析),个别论断的吸收(如对重庆政府的论述和革命延安道路的提出),研究方法的参考(如研究根据地采取历史与社会

调查结合、定点考察、比较分析的方法)均有可取之处,而立论陷于误区或史实不确者亦屡见不鲜,诸如“侵略有理论”、“国民党单独抗战论”、“中共党内权力斗争论”、“中共控制知识分子论”等均宜加以评析。

近年来大陆对海外和港台研究抗战史的信息了解、论著翻译和成果评析颇有改进,但仍不尽及时、全面和准确,似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,俾能有助于国际间和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,促进抗战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历史系)